



两会特刊

5
工人日报
WORKERS' DAILY

2015年3月4日 星期三 农历年未年 正月十四 http://www.workercn.cn 责任编辑:赵亮 郎成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bwhwx@sina.com

两会·预报

3月4日(星期三)

政协

上午 9:00 小组会议

下午 3:00 小组会议

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不追明星 追民生

□本报记者 罗娟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京开幕,毫无例外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前,尽管春天的寒风“猛烈”,全国政协委员依然遭遇了记者们蜂拥而至地“围追堵截”。

多次采访两会的记者发现,以前演艺界明星委员一出场往往被记者围堵,可是,这一次却并非如此。遭遇记者围堵大战最激烈的是那些在民生等热门话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委员。

距离会议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在中小企业融资和创新创业话题上炙手可热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CEO李彦宏被记者围堵里三层,水泄不通,直到开会前最后几分钟才进入会场。

金融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梅兴保在开会过程中出来上厕所,被记者们一直簇拥到厕所门前,20米左右的距离显得寸步难行,被问及的话题都是围绕当下最热的“小微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不动产登记”等等。

“深化改革”、“雾霾治理”、“一带一路”、“简政放权”、“反腐败”这些词汇如同在弹幕上频频闪现,“火爆”了人民大会堂。

在俞敏洪、李彦宏被围堵时,记者看到,几名演艺界的明星及当红歌星从人堆旁走过,并未引起很大关注。唯一被记者“爆堵”的明星是姚明,他被问的最多的问题也是围绕体育改革。

今年的两会原本属于“平常年”,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三个“特别年”让这一年和本次两会都显得“不寻常”。

许多政协委员接受采访时也说,这次如果没有点真东西,没做仔细的研究或者调研,很难通过这次两会的大考,更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唐山市委主委胡宁的专长是医学,但是他对于京津冀协调发展和唐山钢铁煤炭等产业转型升级做了大量研究,很多数据脱口而出,不是明星人物的他被记者围堵到最后错过了返回驻地的上车时间。

两会本来是每年一度的参政议政的头脑风暴大会,但是过去民众更多吐槽的常常是源于某些明星或者“雷人雷语”以及一些“脑洞大开”的提案。本次两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背景,民众的关注度更多是自己的“获得感”如何通过代表委员履职实现,民众希望看到的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想法、新建议,如果委员大“任性”,不下功夫研究,分分钟就会被“上头条”。(本报北京3月3日电)

记者走笔



6位一线职工对两会说

两会前夕,本报记者走基层、蹲一线,记录职工所思所盼,向代表委员捎句话——

“别让我们蹲在路边吃开水泡馍”

□本报记者 康劲

凌晨3时30分,手机的闹铃准时响起。赵淑桂拿着扫帚出门——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今年53岁的赵淑桂,是兰州市城关区环卫局武都路清扫小组组长,这样的生活她已经过了20多年。

凌晨4时,赵淑桂和其他的5名工友准时在武都路与永昌路十字路口会面。扫帚挥动、装车、清运、再装车、再清运……

8时,赵淑桂等人来到了陇西路口,每天这个时候,看护公厕的老王就为她们烧好了开水。一杯白开水,一个干馍,几位清洁工的早餐就是在公厕旁的马路边吃碗开水泡馍。一间小小的休息室是兰州8000多环卫工的共同奢望,“我们不要太大,只要能换衣服,能放包,能不再露天啃馒头。”

据了解,2005年建设部就曾发布《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的公告,要求各地应建有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休息场所。但是,财政投入力度不足,环卫工作站的数量和设施远远无法满足环卫工人的需求。

赵淑桂希望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能够更多关注环卫工的工作生活状态,将环卫工作站的建设当成个事,“别让我们蹲在路边吃开水泡馍了”。

涨工资,能否不裁员?

□本报记者 杜鑫

3月2日中午,朱梁兵在自己经营的小饭馆里为客人们准备着饭菜。他家的饭馆位于安徽省霍山县落儿岭镇鹿吐石铺,“朱大厨”的另一身份是霍山县水电公司烂泥坳四站的副站长,这个跟他家饭馆一河之隔的小水电站每年最多运行4个月。

“这种小水电站全是‘靠天收’,每年4月至8月的汛期才发电。”朱梁兵告诉记者。提到工资问题,朱梁兵挠了挠头。他在这个电站工作了27年,工资1300元左右,扣除五险一金,到手只有1100元。“上世纪90年代,电站工资600元左右,那时这份工作还是个‘肥差’。之后涨到700多元,再就是18年没涨过。”

实际上,工资水平过低一直是困扰小水电站发展的大难题。2011年就有媒体统计,全国约有4.5万座小水电站,由于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电价偏低等问题,导致经营效益差,职工工资低。朱梁兵透露,“县里供电公司曾经想要合并我们小水电站,但是前提是让我们精简人员。虽然合并后工资会涨1倍,但是,站里大多数都是工作了二十年的老职工,让他们再谋一份工作太困难了。”

朱梁兵希望代表委员们给出主意:涨工资能否不裁员?

退休金23年为为何仅涨1400元?

□本报记者 孙喜保

“希望退休工资能够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长。”辽宁大学新闻系主任、副教授李东转述了母亲张阿姨的期盼。

39岁的李东,母亲已经68岁,曾经是辽宁大连国企家庭和子。还在读中学的李东,对于母亲提前退休后的生活还有着深刻的印象,“本来生活精打细算,之后就更加节俭了。”

李东告诉记者,母亲对于每年的两会都非常关注,尤其关注退休职工退休金上涨的问题。从退休到现在,近23年的时间,张阿姨清晰地记得退休金共涨了8次,由当年的每月500多元涨到现在的1900元。

“母亲希望自己的工资能够接近社会平均工资,并跟得上通胀水平。”李东说。

“对创业企业的减负政策,再快点、实在点”

□本报记者 李瑾

23岁的必趣网CEO张果,被人称为“最穷的百万富翁”。必趣网是一家微电影网站。上线一年,注册用户突破百万。

2011年,正在上大二的张果,选择休学创业。

中关村对高新创业企业的孵化力度,全国闻名。100万元天使投资不到半年就花光了,张果去申请5%的房租补贴,被要求有“中关村高新企业的认定”,于是,“花了2600元买回来一块牌子”,又被要求拿出国家高新产业的认定,就这样,注册资本10万元的公司,为了拿到那5%的补贴,花了8000多元,最后还是什么都没申请到。

“国家好像天天说扶持创业,但像我们这种真的在干事的企业,根本也不需要国家直接给钱,给我们减税,就够了。”张果说。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5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额10万元以内扩大到20万元以内,并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张果表示,无论什么政策,让他这样的创业者尽快能够受益,才是好政策发挥了好作用。

“为什么博士的孩子只能考高职?”

□本报记者 赵昂

在北京一家民营科技公司从事科研与管理工作的张洪雁博士,家里摆满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证书。

但是,由于是在民营企业工作,张洪雁没有北京户口。她是2005年7月从烟台来的北京。到北京后,张洪雁先是办暂住证,后来公司又帮助办了工作居住证。虽然孩子也几经周折,最终在北京上了小学,但未来的高考,依然是过不去的坎。

张洪雁坦言,“我是一个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在北京买房安家,对北京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都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我的孩子,按现有政策,未来只能上个高职,要么就是出国。我难以接受,觉得心寒。”

张洪雁告诉记者,她遭遇的问题,是许多供职于民企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的共同困境,在民企不管做得多好,都很难拿到户口。也正因此,民营企业对科研和技术人才缺乏吸引力,创新潜能也难以激发。

现在,张洪雁一直关注着积分落户政策,因为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一直未落地。“希望代表委员能关注我们这一群体,在完善这个政策时,能够科学地考量我们对城市的贡献。”

期望一张医保卡通行全国

□本报记者 罗娟

哈尔滨退休职工黄大姐每年都会来北京女儿家中住一段时间,但是异地看病贵、报销难的经历让她养成了每来北京,必会“药物塞满行李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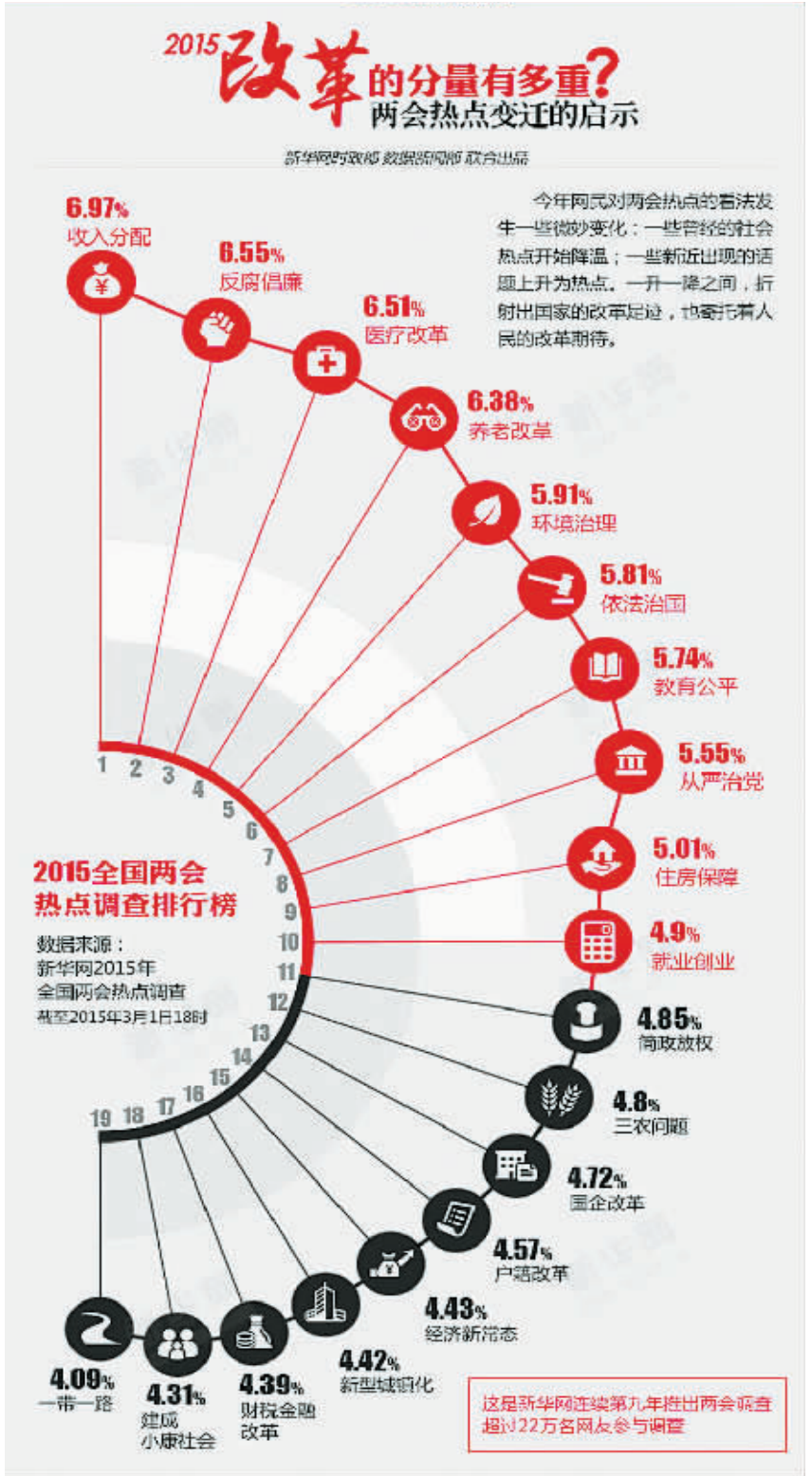
两年前,黄大姐出现头晕、胸闷等症状,女儿带她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医院收费单据和就诊记录显示,她做了心电图、脑部CT等几项检查,加上输液,一共花费了1000多元。

“医生建议做进一步检查。”黄大姐随后又在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中医院就医,再次花费了七八百元。

“近2000元的花费,全部自己承担。”黄大姐咨询了哈尔滨市医保中心,享受哈尔滨市医疗保险待遇的她,要想报销在京医院检查的医药费,必须是急诊,必须接受住院治疗,并且必须在住院5日内向哈尔滨市医保部门备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显示,2013年,全国职工医保享受医疗服务总人次为13.4亿人次,而全国跨统筹地区转移医疗保险关系仅120万人次。

黄大姐期待上两会的代表委员说句话:一张社保卡,全国可看病,能报销的事情尽快实现!



加班补贴、带薪休假相关条款应写入劳动合同

——访全国人大代表袁周

本报讯(记者李丰)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袁周呼吁,“职工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相关条款应写入劳动合同,让职工明明白白维权。”

袁周告诉记者,近来,有关职工加班、被加班、亚健康、过劳死以及带薪年休假落实不力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因此,非常有必要将职工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相关条款列入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必备内容,严格执行,确保职工权利。

2014年,贵州省总工会对11家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进行加班和带薪年休假情况抽样调查,发现均不同程度存在加班现象,但加班补贴及带薪年休假落实不到位。调研中,贵州省总工会还发现,虽然有的单位不提倡加班,但分配给职工的工作量在8小时内根本不可能完成,职工只能“被迫加班”,而让职工陷入维权困境的是,这些企业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中,在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问题上,没有相关约定。

袁周建议,应当建立健全单位职工带薪年休假计划制度,并由专人负责督导落实;确因工作需要又不能安排调休的,按相关规定享受相应工资待遇。要将职工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相关条款列入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必备内容。要建立健全考核制度,将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内容,并作为各项考核的重要依据。

此外,人社部门也要强化职能监督作用,会同工会等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日常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由人社部门牵头,制定统一的加班补贴制度,明确一般工作日加班、节假日加班而不能调休的补助标准,完善职工超额工作报酬规定。对加班补贴、带薪年休假有关规定执行不力和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责令整改,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拒不整改的单位,人社部门或工会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袁周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委员驻地接受采访。

去年被曝光的性侵女童案件高达503起,相当一部分受害者为留守女童 谁来守护留守女童的身心安全?

代表委员建议:加强防性侵教育,填补教材空白,完善未成年人监护机制

□本报记者 赵昂

“这组数据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说。李一飞列举的一组数据,来自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组。数据显示,2014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女童案件高达503起,共有726名受害者,平均每0.73天就发生一起。被性侵的女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监护人不在身边的留守女童。

“在农村,很多被性侵女孩及其家庭受制于传统观念,受到侵犯后不敢说出来,没被曝光的可能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妇联执委、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说。

根据女童保护项目组的统计,在503起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例的受害人中,农村未成年人有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42人。

刘晓静代表告诉记者,“我一直认为,学校应进行相应的教育,但我发现我错了。”

曾在自己学校开办过相关课程的李一飞代表坦言,国内权威的防性侵课本,教案几乎是空白,“应当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特别是公共监护制度。”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有专门的制度来监督教师 and 监护人,建立完善的儿童保护服务制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说,“这种制度,不只是为了防止性侵,也能防止包括虐待在内的多种对儿童侵害的行为,最终形成儿童保护体系。”

在朱征夫委员看来,完善监护机制,不能仅靠公益人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区的力量。他建议,街道(乡镇)、社区(村)加大对区内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关注。

制度建设的呼吁,也得到了政府有关人士的回音,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救助管理处处长倪春霞表示,“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要用制度去斩断黑手,建立一套对孩子侵害行为快速监测、热线报告、评估帮扶的监护制度。”

从今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施行。2月4日,针对江苏徐州一名父亲性侵11岁亲生女儿的案件,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成为全国第一例相关案件中撤销监护权的司法实践。

“这代表着一个好的开始。”朱征夫委员欣慰地说,“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行政监督和司法裁决的对接机制,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